

·调查与思考·

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丁士军 杨晶 吴海涛

【摘要】文章利用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两地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征地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在土地被征收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收入组农户收入呈现向上流动的趋势,而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收入向下流动趋势明显。外出务工的增加和非农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受教育水平提高促进了高收入组农户收入的向上流动,而财产性收入比重下降对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有负向影响;农户面临的经济风险和医疗风险会导致所有组别农户收入向下流动;九江和襄阳两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文章建议,在征地过程中要重点考虑为失地农户提供外出务工等非农就业的机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失地农户的人力资本,设计防范和分散农户经济和健康风险的政策,同时应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征地 家庭禀赋 收入流动性 影响因素

【作者】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吴海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推进,农村耕地被征用情况日益普遍,失地农户越来越面临着收入差距和不均等问题。从动态的视角(征地前后)考察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剖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现状和影响因素,对妥善处理失地背后隐含的经济补偿和生计重建问题,促进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保障失地农户长期收入提升与生计发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换保障’背景下失地农户的生计重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编号:71173239)的阶段性成果。

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征地使农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其收入创造和生计转型问题已成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一些地区的征地补偿政策往往能给失地农户带来较好的补偿,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收入增长,但这种收入增长是否可持续,需要考察失地农户收入的动态变化与流动性。

已有文献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入流动性的测算。例如,用收入转换矩阵和绝对流动指标等测算收入流动性。这类研究认为,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平等有缓解作用,农村收入流动程度要高于城镇,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向上流动性(孙文凯等,2007;王朝明、胡棋智,2008;周兴、王芳,2010;江金启,2010)。另一类是从家庭禀赋角度分析农户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既受家庭抚养人口和人力资本禀赋等因素影响,也受非农就业程度、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地理位置和税费负担等因素影响(章奇等,2007;严斌剑等,2014)。失地农户是一类特殊群体,其收入及流动性既会受到一般因素影响,也会受到特殊因素影响。史清华等(2011)认为,征地对当地农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大部分被征地农户收入不降反升,这可能源于三方面因素:多元的就业途径避免了失地失业现象;多源的财产收入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多重的社会保障提供了重要收入来源。张科静等(2014)从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财产性收入变化等方面验证这些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崔宝玉等(2016)则认为,农户不会因失地致贫,反而会增收,征地比例不会对农户总收入和非农收入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却对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

然而,上述研究缺乏对不同收入分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动态变化及原因的深入分析,尤其是缺乏从家庭资源禀赋及风险冲击角度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分组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征地前后两个时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中部地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状况,认识农户收入流动性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中部地区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是怎样的?不同收入分组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有何差别?影响失地农户收入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因素分别是什么?农户家庭特征因素、风险因素和区域因素对不同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有何差异?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中部地区征地导致的失地农户的收入稳定与提升找到关键抓手,为支持失地农户生计改善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基础证据。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一) 分析框架

农户模型为分析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Bardhan等,2002)。基于农户生产函数,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产出由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本决定。农户已有的资本积累和失地过程中所得的征地补偿共同构成了农户总的生计资本。在农户收入决定模型中,各类生计资本(或资源禀赋)起着核心作用,区域、风险和制度等外部因素也起着

重要作用。征地及其补偿收入既是政策制度带来的外部影响因素,也是导致农户核心生计资本发生改变而形成对收入影响的关键。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征地影响农户的资本边际收益,进而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最终带来农户收益的变化。

本文建立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分析框架。由于农户失地前后的时间区间较小,风险冲击和区域因素可以假定为不变;失地会直接导致农户的家庭禀赋变化,因此家庭禀赋是动态的,遭受不同风险冲击的“理性”农户会基于家庭禀赋及偏好进行生计决策。生计决策或风险应对策略的差异可能会引起不同收入组农户及同一收入组内部农户的收入分化。从动态视角(征地前后)来看,不同类型失地农户收入持续分化会造成不同家庭禀赋的农户收入地位的变换,进而可能导致农户收入流动分化现象。区域因素和风险特征会对农户收入流动性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研究步骤为:(1)将农户按照收入分为不同的组和等级,利用收入流动矩阵方法刻画不同收入组和收入等级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进行组间比较。(2)分析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将被解释变量设为农户收入流动性的有序类型进行分析,能够反映农户收入流动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农户家庭禀赋特征、风险因素和区域因素等方面选择解释变量,设定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二) 分析方法

在以往相关研究(章奇等,2007;吴海涛、丁士军,2013)基础上,本文首先将农户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阶段的收入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进行折算,然后放在同一序列中从低到高排序,并根据排序结果进行分组,分别按照10%、10%、20%、20%、20%、10%、10%的分位比例确定低收入组(最低、低)、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组(高、最高)3个组共7个等级,得到农户收入中位数。然后再将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时间点的农户收入数据分开,按照上述相同的收入组和等级标准进行重新分组,分别得到征地前和征地后两组农户收入等级状况数据。农户征地前后的收入如果处于不同的收入等级就具有收入位序变化的动态含义,将不同等级进行比较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征地前后农户收入的动态变化。

本文在收入流动类型划分研究(张科静等,2014)基础上进行改进,把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划分为4种类型,即上升、上稳、下稳和下沉。“上升”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从低收入组流向中等收入组或高收入组,以及中等收入组流向高收入组;“下沉”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从高收入组流向中等收入组或低收入组,以及中等收入组流向低收入组;“上稳”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收入组不变,但收入等级有所提升;“下稳”类别表示征地后农户收入组不变,而收入等级固定或下降。本文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三) 研究数据与样本地区介绍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2013年我们对江西九江市和湖北襄阳市的调查。九江市处于长江黄金水道和京九铁路大动脉构成的中国南北、东西交汇的轴心,农业生产条件和地理优势得天独厚。襄阳市为鄂西北重镇,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地处鄂北岗地,位于连接湖北、河南并靠近陕南和川东北的交通要道。两地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

较快,土地征用现象比较普遍。两地国土管理部门资料显示,2012年九江市审批的因建设而被占用耕地为5816亩,2015年则增加为17021亩。2012年襄阳市审批的因建设而被占用耕地面积达18602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0.3%左右。九江样本农户实行货币补偿安置,征地补偿款实行一次性付清。2011年左右的征地补偿标准为:水田类每亩32000~51000元;旱地类每亩24000~28000元。样本农户所获征地补偿款多数在10万元以下,其中5万元以下者占43%。襄阳样本农户实行货币补偿方式,但征地补偿款不是采用一次性全额发放,而是按年度分期发放。大部分调查农户水田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600元,旱地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300元,并且要求征地补偿款每年增长5%,补偿时间为2013~2028年。在货币化补偿之外,两地都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对被征地农民实施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并对被征地农民实施就业培训和推行社会保障政策。

九江农户调查地点在经济开发区和庐山区,襄阳农户调查地点在襄州区。在这3个市辖区内共调查10个有征地的村,这些村庄均位于城市的郊区地带,传统上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征地拆迁后所有农户都集中居住。这次调查在九江经济开发区为152户,庐山区为142户,襄州区为327户。调查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变 量	频数	百分比	变 量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户主婚姻状况		
男	1337	49.89	未婚	106	17.07
女	1343	50.11	已婚	505	81.32
户主健康状况(自评)			离婚及丧偶	10	1.61
非常差	18	2.90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比较差	61	9.82	小学以下	77	12.40
一般	93	14.98	小学	63	10.15
比较好	300	48.31	初中	101	16.26
非常好	149	23.99	高中	215	34.62
农户类型			大专及以上	165	26.57
纯农	113	18.20	劳动力年龄结构(岁)		
农业兼业	80	12.88	16~24	85	13.69
非农兼业	261	42.03	25~34	155	24.96
非农	167	26.89	35~44	105	16.91
农户劳动力规模(人)			45~54	128	20.61
1	46	7.41	55~65	148	23.83
2	144	23.19	失地程度		
3	154	24.80	轻微失地	41	6.60
4	206	33.17	中度失地	43	6.92
5	56	9.02	较严重失地	63	10.15
6	15	2.41	严重失地	474	76.33

三、收入流动性分析

按照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分类,本文计算各收入组农户的流动概率,在改进前人研究方法(章奇等,2007;张立冬等,2015)的基础上构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矩阵(见表2)。表2显示,从不同收入流动类型的概率看,49.76%的农户收入流动类别表现为“下稳”,也有19.81%的

表2 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矩阵 %

征地前	征地后			
	上升	上稳	下稳	下沉
低收入组(N=130)	50.77	11.54	37.69	0.00
中等收入组(N=385)	14.80	22.08	50.13	12.99
高收入组(N=106)	0.00	10.38	63.21	26.41
合计(N=621)	19.81	17.87	49.76	12.56

注：征地前农户所在收入组别与征地后农户收入流动方向的卡方检验结果为：Pearson $\chi^2(6)=139.0895$, $P=0.0000$ 。由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已经是收入组划分的临界组，这意味着不可能有更高收入组“上升”，也不可能有更低收入组“下沉”。

收入地位越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越强，保持自身地位的能力越弱。进而发现，低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更倾向于“上升”，中等、高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更倾向于“下稳”，这也证实了同一收入组内部收入等级的变换是非常有意义的。进一步来说，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并且初始收入位置越高的中、高收入组农户收入越可能向下流动，初始收入位置越低的低收入组农户收入更易向上流动。

虽然征地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所缩小，农户收入的绝对差距也在减小，但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例如，征地后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相差 117 603.86 元。不同分组农户的收入变化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的收入流动隐含着以下问题：(1)农户收入流动内部分化。征地后仍有 64 户低收入农户组别未变，固定在低收入组。此外，高收入组农户的比重及收入均值上升最大，而中等收入组农户比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2)农户收入向下流动倾向较为明显。例如，样本农户的收入流动类别为“下稳”和“下沉”的概率分别为 49.76% 和 12.56%，并且这部分农户失地前处于中等收入组的可能性最大。征地后，相当一部分中等、高收入农户(共 78 户)陷入了低收入组，还有 50.13% 中等收入组农户和 63.21% 高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倾向于“下稳”。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内具有不同禀赋的农户的收入持续分化可能造成农户收入地位的变换，进而可能导致农户收入流动现象。下面本文将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析。

农户收入流动类别表现为“上升”，17.87%的农户收入流动类别表现为“上稳”，12.56%的农户收入流动类别表现为“下沉”。从横向的收入流动性看，不同收入组农户的相对收入流动状况发生了分化。其中，征地后，低收入组农户地位固定的概率最低，中等、高收入组农户则表现出了较大的收入惯性，这说明征地前收

四、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设定

以下考察农户家庭禀赋特征、风险因素和区域因素 3 个层面的不同自变量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不同收入流动分类，即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解释变量是测度家庭禀赋特征、风险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各类指标，既包括连续性变量也包括离散型变量。如果直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会违反许多重要的假设条件，采用多项式 Logistic 模型会损失隐含在序次中的信息，故选择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农户收入

流动状况进行分析较为合理。

设被解释变量为 Y_i , 表示收入流动状况, 它反映了农户收入地位在考察期内的变化状况, 该变量取值越大, 则表示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越差。模型为:

$$Y_i = \alpha + \beta_1 \Delta X_i + \beta_2 R_i + \beta_3 C + \varepsilon_i$$

其中, α 为常数项, ΔX_i 是对具有时间序列变量性质的 X 进行的一阶差分, X_i 为一组家庭特征变量, R_i 为衡量家庭风险的变量, C 为区域控制变量, β 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值,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择

将被解释变量 Y_i 取值设定 4 种分类: 上升 =1、上稳 =2、下稳 =3 和下沉 =4。解释变量主要从家庭特征因素、风险因素和区域因素三大类进行考察。

1. 家庭特征因素

农户的劳动力资本越高, 劳动生产率越高。一般而言, 户主健康状况越好、参加过非农技能培训和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收入流动状况越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 劳动力规模越大, 意味着人力资本状况越好。失地程度、非农活动或兼业程度和财产性收入比重等都对收入流动状况有重要影响。

2. 风险因素

选取是否发生经济风险(无就业机会、自营工商业亏本等)和健康风险(是否发生大的医疗开支)分析风险因素的影响。理论上, 无就业机会的农户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失业风险, 失地后农户的收入地位会下降。农户失去土地后, 自营工商业成为农户非农就业的重要途径, 自营工商业的经营状况关系农户收入的高低。一旦发生自营工商业亏本, 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将会变差。失地后发生了较大医疗开支的农户, 当期的开支会增加, 其收入流动状况也会变差。因为征地而参加“失地农户社会保险”(土地换社保)的农户, 其短期内的经济补偿相对较少, 但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长期保障能力可能会更强。

3. 区域因素

不同地区的农户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并不一致。不同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等)下的农户生产生活方式不同, 遭受自然灾害的概率、灾害类型和受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地区特征变量可能对农户的收入流动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选取九江和襄阳作为地理区位虚拟变量, 以是否发生区域自然灾害作为另一区域层面的考察因素。

鉴于不同收入结构下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可能也不一致, 为了检验上述 3 类解释变量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影响程度, 本文采用分类回归和逐步嵌套的方法分别对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有序回归。

(三) 估计结果

本文通过个案剔除法处理样本缺失数据, 并对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测, 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 利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 针对征地前不同收入群体(低、

中、高收入农户),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5所示。

1. 低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

从家庭禀赋特征看,户主外出务工的低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状况更好。征地前兼业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流动越容易“上升”。劳动力规模越大,收入流动类型为“上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农户的失地程度越高,收入流动状况越容易恶化。就风险因素而言,遭受了家庭经济风险的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为“下稳”的概率是参照组的1.36倍。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农户收入流动为“下稳”的概率是参照组的4.87倍。就区域因素而言,与未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农户相比,征地后发生了地区自然灾害的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恶化的概率更大。调查地区的低收入农户缺乏资本积累,失地后从事非农业活动没有比较优势。征地迫使低收入农户由农业户向非农业户转变,兼业状况和外出务工都影响了农户的收入流动;而未完全失地的低收入农户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受限,农业生产效率受自然风险冲击的影响

较大。

表3 低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风险比
户主健康程度	-0.1488	-0.0879	-0.0196	0.9806
户主是否外出务工	-1.3637**	-1.6295**	-1.6573**	0.1906
户主是否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	-0.0153	-0.7388	-0.8025	0.4482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0.0272	-0.0608	-0.0736	0.9290
农户类型				
农业兼业	-1.0219	-0.4190	-0.3347	0.7155
非农兼业	-1.5700**	-1.3691**	-1.3736**	0.2532
非农户	-2.1710**	-2.2245**	-2.0397**	0.1301
劳动力规模	-0.5941**	-0.5466**	-0.5735**	0.5636
失地程度	0.5921*	1.5104*	1.7652*	5.8426
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	-1.0477	-0.0527	-0.6659	0.5138
是否发生家庭经济风险		0.9059*	0.9978*	1.3687
是否发生大的医疗开支		0.6067	0.9056	2.4735
风险防范因素		1.6942*	1.5834**	4.8716
地理区位			-0.5791	0.5604
区域自然灾害			0.6831*	1.9799
样本量	128	114	114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79.66	68.07	-70.34	
Pseudo R ²	0.2693	0.3122	0.3226	

注:分类变量中户主健康状况非常差、未外出务工、户主未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纯农”户、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为1人、未发生家庭经济风险、无较大医疗开支、未参加“土地换社保”、襄阳地区和未发生自然灾害的农户为对照组。*、**、***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 中等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

从家庭禀赋特征看,户主健康状况越好、有外出务工经历和户主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的中等收入组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家庭劳动力规模越大,收入流动状况越好。家庭财产性收入比重越高,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则越可能“下沉”。尽管征地后中等收入组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比重有所增

加,但大部分被征地农户的资本保值增值或投资营运及金融风险抵抗的能力较弱,农户难以通过金融资产、房产和土地形成财产性收入(史清华等,2011)。就风险因素而言,经济风险对中等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同等条件下,发生了家庭经济风险的农户的收入流动为“下沉”的概率是参照组的1.54倍。就区域因素看,九江地区的中

表 4 中等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风险比
户主健康程度	-0.1852*	-0.1874*	-0.1535*	0.8577
户主是否外出务工	-0.4754**	-0.4802**	-0.4853**	0.6155
户主是否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	-0.9376**	-0.9802**	-0.8826**	0.4137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0.0239	-0.0245	-0.0237	0.9766
农户类型				
农业兼业	-0.9049**	-0.9045**	-0.9695**	0.3793
非农兼业	-1.4365***	-1.4365***	-1.4766***	0.2284
非农户	-1.2649***	-1.1887***	-1.2355***	0.2907
劳动力规模	-0.6079***	-0.6132***	-0.6145***	0.5409
失地程度	0.5039	0.5171	0.6264	1.8708
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	2.3020*	2.4098*	2.5924*	13.3618
是否发生家庭经济风险		0.4444*	0.4348*	1.5447
是否发生大的医疗开支		-0.1743	-0.0964	0.9081
风险防范因素		-0.1623	-0.1732	0.8409
地理区位			-0.4768**	0.6208
区域自然灾害			0.1179	1.1251
样本量	385	363	363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393.27	-391.17	-388.52	
Pseudo R ²	0.0990	0.1038	0.1098	

注:同表 3。

等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更有可能“上升”,表明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状况是存在地区差异的。这种区域差异可能源于两点:(1)调研的国家级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为中等收入农户提供了更多收入机会,而襄阳调研地区不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农就业机会不多。显然经济开发区的征地对失地农户的发展具有更好的机会,这一点也许是具有全国普适性的。(2)本文的数据显示九江征地补偿水平显著高于襄阳,这也意味着征地补偿水平对九江中等收入组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十分重要。一般而言,两个研究地区征地前处于中等收入农户有较大的收入惯性,收入相对稳定,这会促进他们加强教育投入和培训,因此,农户收入流动性受健康、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明显。

3. 高收入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

从家庭禀赋特征看,与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农户相比,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对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收入流动状况越好。与中等收入组的分析一样,财产性收入比重越高,农户收入越可能向下流动。从风险因素而言,发生了经济风险和较大医疗开支的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为“下沉”的概率分别是参照组的 5.51 倍和 2.75 倍,这反映了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对风

表5 高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风险比
户主健康程度	-0.3867	-0.3478	-0.2908	0.7476
户主是否外出务工	0.3255	0.5502	0.4758	1.6093
户主是否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	-0.5193	-0.6409	-0.4969	0.6084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0.1481*	-0.1289*	-0.1588*	0.8532
农户类型				
农业兼业	0.5246	0.2252	0.1521	1.1643
非农兼业	-0.5320	-0.6027	-0.5279	0.5898
非农户	-0.5102	-0.5023	-0.4542	0.6349
劳动力规模	0.3244	0.1207	0.0402	1.0410
失地程度	-0.1294	-1.0732	-0.9191	0.3989
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	8.3595*	7.4702*	8.0044**	29.9422
是否发生家庭经济风险		1.8225*	1.7070**	5.5126
是否发生大的医疗开支		0.7277*	1.0132*	2.7544
风险防范因素		-0.0154	-0.1347	0.8739
地理区位			-0.8346*	0.4340
区域自然灾害			-0.1053	0.9001
样本量	106	106	106	
Prob>chi2	0.0058	0.0002	0.0000	
Log likelihood	-79.20	-71.87	-64.73	
Pseudo R ²	0.1352	0.2153	0.2769	

注：同表3。

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更强的投资积极性,但面临的经济风险往往更大,自营工商业经营亏本更容易造成农户收入流动状况恶化。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研究地区外出务工和参加非农生产活动的低收入组农户和中等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更可能向上流动;劳动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高收入组农户收入的向上流动,而财产性收入比重下降对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有负向影响;在所有组别的失地农户中,经济和健康风险都会带来其收入向下行方向流动。总体上看,研究地区土地被征收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明显的组间和地区差异,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中等和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则更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向下流动。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也存在较大差别。那些收入更容易向下流动的较低收入农户往往具有户主没有外出务工、兼业程度较低、劳动力人数较少、失地程度较高、遭遇过经济风险和遭受过区域自然灾害等特征。

险类变量较敏感。从区域因素来看,与襄阳相比,九江地区的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流动状况更好,这一点与本文对中等收入组农户的分析一致。这再次表明不同区域农户的收入流动性是存在差异的。研究地区征地对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农户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禀赋差异起作用,高收入组失地农户往往具备更多的金融资源禀赋、更高

以上研究结论回答了本文提出的问题,中部地区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存在不同流动方向模式;不同收入分组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带动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外出务工、非农活动、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及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有利位置等;导致农户收入向下流动的主要因素则包括兼业程度低、失地程度高、外出务工少、遭遇经济或健康风险等;家庭禀赋特征及风险因素等对不同收入分组失地农户收入流动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两类研究地区间的差异值得引起注意。九江和襄阳都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农业、工业生产地区和交通重镇,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征地用途的不同对失地农户的补偿和收入流动有不同的影响。九江位于长江中游交通枢纽,有良好的生产条件,国家级的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征地补偿水平较高,这些都给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失地农户带来了更大的向上收入流动性。这些发现显然对同类地区失地农户收入保护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与本文研究同类地区的失地农户的利益事关农村稳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本文建议,提高失地农户收入的政策措施应该围绕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外出务工和非农就业、预防和分散经济及健康风险等方面进行设计,应根据情况对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组和不同家庭禀赋状况的失地农户,实施分类的有选择性的政策措施。

由于所获得的样本农户数据特点,本文仅考察了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阶段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而没有考察多个时期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这在后续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基于样本区域选择数量的限制和征地政策可能具有的延时效用,本研究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结果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 Bardhan P., Udry C. (2002):《发展微观经济学》,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崔宝玉等(2016):《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期。
3. 江金启(2010):《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南方经济》,第2期。
4. 史清华等(2011):《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7村调查——兼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与改革》,《管理世界》,第3期。
5. 孙文凯等(2007):《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经济研究》,第8期。
6. 王朝明、胡棋智(2008):《中国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基于多种指标测度》,《管理世界》,第10期。
7. 吴海涛、丁士军(2013):《贫困动态性:理论与实证》,武汉大学出版社。
8. 严斌剑等(2014):《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经济学(季刊)》,第3期。
9. 张科静等(2014):《上升还是下沉——基于收入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研究》,《学术论坛》,第10期。
10. 张立冬等(2015):《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均等化: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 章奇等(2007):《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12. 周兴、王芳(2010):《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管理世界》,第5期。

(责任编辑:朱 萍)